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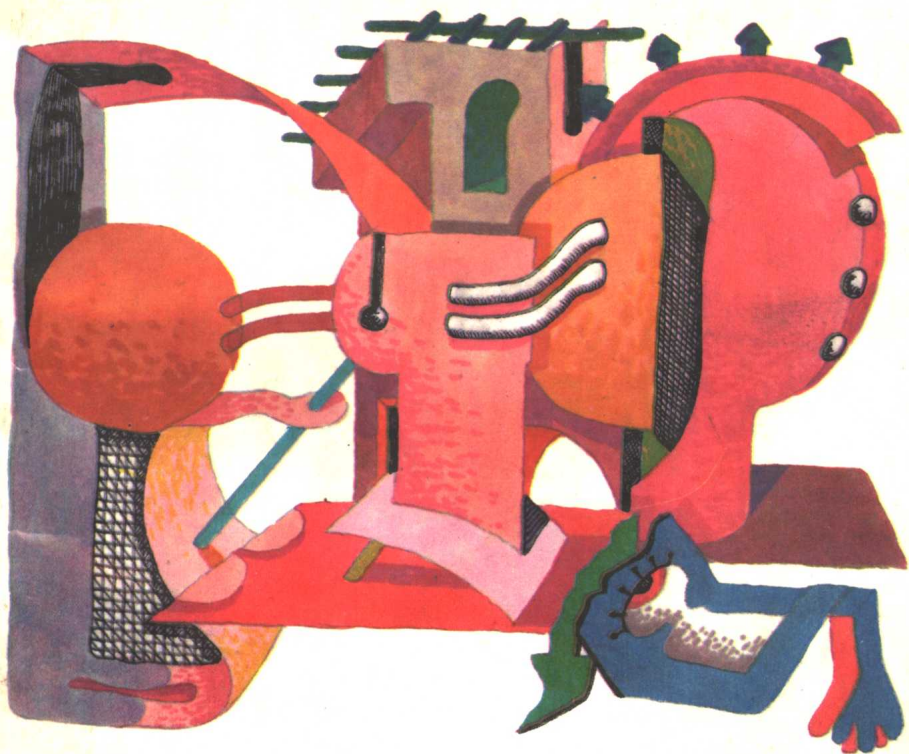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

主编／谢冕 副主编／李杨

意义的诱惑

●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当代转型
程文超／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

主编／谢冕 副主编／李杨

意义的诱惑

●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当代转型
程文超／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 05 号

意义的诱惑——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当代转型
YIYIDEYOUHUO

程文超 著

责任编辑:胡卓识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2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155000 字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

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印数:6 000 册

定价:6.80 元

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索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总序

谢冕

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我们已把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抛在了身后。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百年的长途之上，洒满的是汗水、泪水和血水。那是一条为苦痛和灾难所滋润的道路，那又是一条屈辱和创伤铺成的记忆之路。近百年我们中国人希望过、抗争过，也部分地到达过，但依然作为世纪的落伍者而存在。落伍的感觉残忍地抽打着中国，使我们站立在世纪末的风声中难以摆脱那份悲凉。

中国知识分子未曾辜负这一百年，他们和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纪共命运。自从上一个世纪中叶中国海附近出现了在当日的中国人看来是怪物的西洋舰队，那隆隆炮声中腾起的硝烟惊破了强盛的帝国梦想。随后开始的是列强为所欲为的践踏。中国从自认为天下第一的王国尊严下跌到负数。这造成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重压。

这一百年有过无数志士仁人的奋斗牺牲，知识分子没有回避他们承担的那份感世忧时的沉重。小农经济汪洋大海般的保守麻木，使中国知识分子自然生发出文化精英意识。这使他们自觉地对时代和社会作出承诺。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激情与作为精

英的使命感的结合，造出了极为动人的精神景观。近百年的社会激荡之中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与智慧的投入。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本世纪下半叶为结束中世纪式的文化暴虐而进行的抗争，中国知识分子都付出了积极的劳绩。

艰难的时势加上历史的积重，特别是与外界接触之后反观自身，一些新鲜的先锋的思考遭受封建积习的禁锢，促使知识界的先进人士对传统文化秩序持警惕的和怀疑的态度。当挽救危亡和变革现实的奔走呼号受到传统势力的扼杀和阻挠，这种激进的立场便获得了社会广泛的同情与理解。由此派生出来的革命性即寓于对传统的否定之中的价值判断，也就成为当日普遍的思维倾向。

这当然是一种偏颇。中国悠长的文化传统是历代中国人创造实践的综合，它拥有的智慧性和沉雄博大都曾使世人为之倾心。在古代和今日，中国文化为丰富和促进世界文明所作的巨大贡献无可置疑。中国人理应为自己先人的建树自豪。但中国文化在它发展历程之中形成的封建性体系和价值观，作为维护过去社会形态的原则体现，已成为现代社会前进的羁绊，这当然具有消极的品质。基于这样的前提，对传统文化加以质疑而有所扬弃有它的合理性。

我们希望站在分析的立场上，我们愿认同于近代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呐喊、抗争以及积极的文化批判。因为它顺应了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它的功效在于排除通往这一目标的障碍。但我们理所当然地注意到保存和发扬那些优良传统的必要，而避免采取无分析的一概踩倒的激烈。

不偏不倚是庸俗的。因为这种想法迎合了所有人而可能掩饰和冲淡原本的积极动机。本世纪才智之士的文化批判是前驱的抉择，觉醒的知识者心仪于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决绝于陈旧

的历史重荷。为图新而弃旧，因前进而义无反顾。他们把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一律视为压迫而指归于反抗。要是我们认识到中国社会对自由人性和民主体制的戕害，我们当然不会对这种矫枉过正的言行感到意外。当然，我们希望当我们面对现代的诱惑时不至于忘却先世的辉煌——这并不意味着对它的膜拜。

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受制于百年的危亡时世太重也太深，为此文学曾自愿地（某些时期也曾被迫地）放弃自身而为文学之外的全体奔突呼号。近代以来的文学改革几乎无一不受到这种意识的约定。人们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时，宁肯相信文学制造的幻象；人们发现教育、实业或国防未能救国时，宁肯相信文学能够救民于水火。文学家的激情使全社会都相信了这个神话。而事实却未必如此。文学对社会的贡献是缓进的、久远的，它的影响是潜默的浸润。它通过愉悦的感化最后作用于世道人心。它对于社会是营养品、润滑剂，而很难是药到病除的全灵膏丹。

一百年来文学为社会进步而前仆后继的情景极为动人。即使是在文学的废墟之上我们依然能够辨认出那丰盈的激情。我们希望通过冷静的反思去掉那种即食即瘕的肤浅而保留那份世纪的忧患和欢愉。文学若不能寄托一些前进的理想给社会人心以导引，文学最终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即真的意味着沉沦。文学救亡的幻梦破灭之后，我们坚持的最后信念是文学必须和力求有用。正是因此，我们方在这世纪黄昏的寂寞一角辛苦而又默默地播种和耕耘。

文学回到家园的醒悟仅仅是最近十年发生的事实。在以往我们花费在非文学上面的精力的时间太多了。在文学研究领域，这种花费表现在文学被指令无休止地为其它意识形态注释。他们借文学说他们的故事，文学真的变成了叫做传声筒的东西。现在我们终于有权力发问：文学难道不应关心自身？当然文学应该

也可能关心文学以外的世界。但不论是权威还是神圣，他们要文学做的，必须通过文学的方式和可能，这包括文学的旨趣。

文学必须建设和完善自身而后才能建设和完善社会，文学也只能通过这样的途径关注社会。这一百年的文学发展迅猛但并不健全，在某一个或几个时期（如六十年代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文学甚至成为社会的破坏因素，而这一切恶行却是以庄严和神圣的名义进行的。

作为二十世纪的送行人，我们感到有必要把这一代人的醒悟予以表达。这种表达当然只能通过文学的方式。我们期待着放置于百年忧患背景之上而又将文学剥离其它羁绊的属于文学自身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意味着绝对的纯粹性，它期待着文学与它生发和发展的背景材料的紧密联系。我们希望这种思考是全景式的，通过对于文学追求的描写折射出这个世纪的全部丰富性。

以往对于文学的描写大体总是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笼罩之下进行。文学在批评和历史研究方面的独立的合法性并未得以确认，文学没有进入自由状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畴的提出为健全文学研究提供了契机。以一百年的文学为单位对文学的总体观照的方式自然地扬弃了非文学的干扰，从而有可能对文学进行独立的和自由的考察。我们希望这种文学研究不仅为纯粹学术品质的倡导提供可能性，还希望为下一个世纪的人们对我们所传达的世纪之交的情怀保留下一些特殊的记忆。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一日于厦门美仁新村

前 言

任何时代的文学批评都是一个关于意义的故事：或追寻、或消解，意义，总作为缺席的在场被谈论。于是批评家成为与意义捉迷藏的一群人。古往今来，批评家们乐此不疲地玩着这个游戏。他们时而自信而自豪地宣称：我能抓到意义！时而以揭穿谜底的口吻提醒人们：谁也找不到意义，因为意义，根本就不在！而意义却是这样一个怪物：你寻觅它时，它藏而不露，在窃笑中让人们把心力耗尽；你追逐它时，它象天边的地平线，把追逐变为永远的放逐；而当你解构它时，你谈论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它——意义。

意义就这样成为对批评的永远的诱惑。

意义，在我们看来——或者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意义——是对人而言的一种价值。它曾被作为人活着的根据和世界存在的理由。一句话，它指向终极关怀。

那么，批评为什么非与意义玩游戏不可？新批评与形式主义批评不是曾成功地将批评游戏的范围设定在文本之内吗？如瑞恰慈所说：“重要的不是诗所云，而是诗本身。”^①然而，如何界定“诗本身”？美国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说，“文本和世界之间或文本和语言之间的对立是站不住的。即使文本仍被视为一种沉默的、印出来的客体，有它自己听不到的乐曲，但大量的例外，大量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和形式的环境条件仍然会影响实际的文本。”^②赛义德列举了大量例证颠复了文本的界限。

① 转引自赵毅衡《新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第14页。

② 爱德华·赛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

是的，无论批评家打何种旗号、作何种宣言，批评实际上都在某种程度上透过文学文本，读解人生、世界这个大文本，从事关于人生、世界意义问题的探寻。从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看，新批评、形式主义的所谓进入文本、进入形式，也只是他们读解人生、世界的一个策略。这个精致的策略当然早已被人们揭破，送进了艺术博物馆。

不管怎样谈论意义，批评都进入了对文化问题的思考。“文化”——对这一当今界定最为驳杂的概念，我们不想多作辨析。只想指出，我们在这一意义上使用它：文化，指与终极关怀和文明走向相关的精神产品。这一“精神产品”是从操作中产生并可投之于操作的。从一定角度上可以说，文化是人类设计自身的策略。荷兰当代哲学家冯·皮尔森对此曾有精彩之论：“‘文化’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换句话说，‘文化’是我们自己的制作，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注意到“反文化”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设计自身的策略，那我们便会同意皮尔森的另一观点：“文化的发展不是在我们之上和之外发生的；相反，人自己必须找到一种文化战略。”^①批评永远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摆脱不了意义，也就摆脱不了终极关怀与文明走向的纠缠。然而，不同的批评家对于这一纠缠的思考却是迥然不同的。因而批评不仅是关于意义的故事，也是关于文化的故事。

中国文革后的文学批评无疑是关于意义、文化的精彩故事。在十多年的故事长河里，它不断获得读解人生、世界的新角度。故事的展开轰轰烈烈、悲悲壮壮，带着激情、带着喧嚣、带着

^① 冯·皮尔森：《文化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263页。

冷峻，带着它前所少有的气势与胆魄、决心与抱负。它的繁荣几乎是空前的，它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它成为一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现象。

文革后文学批评作为故事，是一个典型的“文本间”。在他的故事里有“他者”故事的踪迹、乃至“他者”文本的“嵌入”，构成多重文本。古人的文本自不必说，它不仅作为被反叛的对象——新老传统——在文革后批评文本中出现，而且在语言、思维深处，其“痕迹”在文本中是抹不去的。一个更具时代特色，更显而易见，更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西方文本以各种形式在文革后文学批评文本中的出场。十多年来，中国文学批评故事的隐藏叙述者以极大的容受力，把西方几个世纪以来的批评话语^①纳入自己的视野，使批评成为一个痕迹叠痕迹的巨大文本间，一个包含着中西思考的错综复杂的关于意义、文化的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究竟是怎样被叙述的？故事各部分是怎样被“设置”，以及怎样运作的？作为一个痕迹丰富的文本间，它给我们对意义、文化问题的思考提供了些什么？这些问题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

本书的论述将以八十年代以后的文学批评为主，而将1976年至1979年的批评作为八十年代批评故事的前奏。任何故事都是开放的，不同的读者从中读出的是不同的故事。也就是说，人

① 话语 (discourse)，在西语中原指一个完整的单位语段，一个符号集团。福科给话语赋予了更多的含义。福科批判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言语的二元论，认为它忽视了语言形成过程中的第三要素：话语。在福科那儿，话语是对所谈对象的系统谈论的实践。可以这样理解，福科用对话语实践的研究，取代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语言法典、规范的研究。也就是说，“话语”不从是否具有真理性这一维度而从实践过程的维度去指称某一言论、理论。本文即从这样的含义上动用这一术语。

们都将故事作为一个整体去读，但每个人只能读出他们关注的侧面。作为第一次将文革后文学批评发展作为整体去研究的尝试，本书自然将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文本去读，但本书只能从自己的角度读出其中的某些方面。其盲视是显而易见的，但那个精彩故事的呼唤却使笔者无法抗拒。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神性”的隐退与他者的显现	(1)
一、在神性与他者的空间地带	(2)
二、误读：时间转化为空间	(8)
三、八十年代批评的双重冲动	(13)
第二章 在历时/共时的他者话语里奔突的中国“人”	(17)
一、坛子打破之后	(18)
二、独特历史语境里走出的“人”	(23)
三、感性生命：魔鬼与天使的产儿	(27)
四、个性发展与“绝对命令”	(34)
五、理性：西学东渐的历程	(42)
六、通往自由之路	(48)
第三章 裂缝的张力：面对“需要修补的世界”	(52)
一、又见现代主义：对人道主义的战略策反姿态	(53)
二、犹豫的放逐：这里的“酒神”与“生命之流”	(65)
三、填塞式掏空：面对人与世界的意义	(74)
四、“范式”革命的时分：道不尽的与走不出的	(83)
五、重新咀嚼《野草》的悲凉	(94)

第四章 在追寻中躲避“无法修补的世界”	(98)
一、无垂无钧的“垂钓”	(98)
二、话语欲望与策略	(102)
三、“逃离”焦虑后的“失语”	(110)
四、历史与平面：批评家叙述的故事	(120)
五、叙述“叙述圈套”时的圈套	(132)
六、能指滑动与滑动能指	(139)
第五章 文化重建：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文学批评	(145)
一、无法被话语宰割的大地	(145)
二、“走向世界”的迷雾	(148)
三、超越“中国结”	(150)
四、寻找被流放的“边缘”	(155)
第六章 模糊思维：东方智慧之光	(157)
一、福科们的困境	(158)
二、模糊：超越理性/非理性	(166)
三、“非善性”发现：辉煌地走向反面	(172)
四、人生、老虎与草莓	(179)
五、罗丹之思与庄生之梦	(186)
参考文献	(192)
后记	(206)

第一章 “神性”的隐退与他者的显现

当文学批评终于在自己的历史上再次看到一个世界格局的时候，它无疑面对一个强有力的“他者”——西方文学理论批评。这时的文学批评便站在了这样一个“点”上：在纵轴线上，它面对着自己的传统，横轴线上，面对着他者的话语，而在它的前面，则是中国当下的、隐藏着历史的现实人生与文学艺术。这个“点”，不是直线上的某个点而是错综复杂网络中的一个结。因而，它所面对的不是处于人们通常习惯表述的“一端”、“另一端”这种方位，而是网络里的各个不同因素。当我们考察文革后文学批评与他者的关系的时候，便不能不考虑到这张网。这既有利于我们看到文革后文学批评是作为“网”中的一个“点”去与“他者”发生关系，又有助于我们了解“他者”是如何并以何种面目进入这张网的。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西方文学批评早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已进入后现代主义话语，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学批评作为一个“自我”在从“他者”里寻求确立、寻求改造、寻求建设时，眼中的“他者”不是在共时中存在的后现代主义，而是历时上的现代主义。更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深入进去时，发现所谓“现代主义”在当时的文学批评中某种程度上也只是一个新词语，作用于批评的真正的“他者”，

是西方十八世纪以降的理性精神。在空间轴上，中国人勇敢地取石他山，在时间轴上却“舍”近求远。复杂的是，“近”又并非被完全“舍”去，尽管只是词语等意义上的存在，它毕竟以某种面目出场，这给它在“网”中的“地位”变化提供了前提和合理性。西方文学批评这个“他者”便在文革后文学批评这个“自我”中同时以两种面目出现着：十八世纪的理性精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主义。中国文革后的文学批评，便是这样一种具有张力的运作。

关于“朦胧诗”的批评，是我们研究这种“具有张力运作”起始状态的重要对象，对于我们理解文革后文学批评走向有着重要作用。

一、在神性与“他者”的空间地带

“空间地带”只不过一个比喻，它不意味着有着距离的“跨度”，而标志着某个“节”。在中国文坛还在左倾与封建的“神性”中笼罩着时，批评没有“自我”。“他者”无需，也不可能出现。在神性隐而未退、“他者”现而未出之时，对一种文学新现象的把握，则需要一个中介、一个反思历史又联接历史的环节，一种评价新现象的智慧。

词性的变异往往具有意识形态性。今天，当我们谈论“朦胧诗”时，我们是在谈论中国新诗变革史上一个有意义的文学现象。而当“朦胧”一词最初出现以指称那一文学现象时，却带着非议，“朦胧”的背后隐含着一套具有神性的意识形态话语。造神运动随着十年文革结束而结束了，神性幽灵的真正退出却远非易事。在文学的创作、欣赏、批评领域，神性内化为一系列规则，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思维。在这些“规

则”中，诗歌被认为是能最为本质的反映社会生活主流的艺术样式。本质/非本质，主流/非主流的二元对立，成为区别好诗、坏诗的重要标尺之一。而何谓“本质”，何谓“主流”是无需诗人去发现的，早有一系列规定。诗于是成为颂歌，诗人的任务只是展开百灵鸟似的歌喉，放声高歌。与颂歌的内容相适应，诗歌在艺术形式上需要明白晓畅。诗实际上被定义为一个简洁的公式：颂歌+明畅。二者缺一不可，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合体。当只有颂歌没有明畅或只有明畅而无颂歌的诗出现时，人们自然会怀疑，这是诗吗？——诗的“公式”不仅规定了诗歌创作，更训练、造就了一大批欣赏者、批评者。

然而，一种既无颂歌又无“明畅”的诗竟然出现了。七十年代末，当北岛、顾城、舒婷等青年的诗从“地下”走入“地上”，从手抄本、自办刊物中逐渐进入公开发行的各种诗刊、杂志时，有人指责它“朦胧”、“读不懂”恐怕有几分真实——有人确实不知道诗还能如此写法，或者说如此写出来的东西还能是诗。不妨回想那时出现的有意思的现象：“朦胧诗”这一雅号是反对朦胧诗的人赠与的，而客观讲关于朦胧诗的真正大讨论却不是他们“挑”起的——那是在朦胧诗的肯定者发表文章之后。在此之前反对者除了说“朦胧”、“不懂”之外，别无语言，连批评都不知从何入手。朦胧诗在他们面前只是一个异端，一个怪物。用现有的文学理论武器，他们无法切入。

多少年以后，当人们翻开关于朦胧诗讨论的资料时，研究者也许会惊讶：诗无达诂。懂与不懂不是评论诗歌的语言，用懂或不懂去肯定或否定诗作是一种远离诗歌欣赏的低层次纠缠。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读者恰恰是从这里起步的。因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人们无法轻松地甩开懂与不懂的话题，因为那低层次纠缠里蕴含着意识形态的高层次内容。

因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谢冕那声“在新的崛起面前”的呐喊引起了那么大的震动。^①在这声呐喊里，谢冕首先肯定了朦胧诗是诗，是新诗，而且正在“崛起”。这种肯定如果不是对原有诗歌公式的否定的话，至少宣告着：旧的诗歌观念是片面的、狭隘的，他说，“我们的新诗，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这一判断迅速引起了大的争议。异议者举出各种“论据”以说明我们的新诗道路不是越来越窄狭，而是越来越宽广。这种窄与宽的讨论，与其说是围绕着新诗道路，不如说围绕着诗歌观念。旧的观念一旦被宣告“终结”，受这一观念训练而形成的创作、欣赏习惯便被抽去了根基，与此相连的创作者、欣赏者的身份、地位便有动摇的危险。对那一话语/权力的留恋是可以理解的。

谢冕并没有止于对“新的崛起”的肯定，他巧妙地将句式扩展为“在新的崛起面前”。这一扩展的意图是明显的，作者希望直接对欣赏界、批评界、理论界发言，直接对批评理论观念发言。谢冕的语气是平和的，他并没有对旧的进行激烈的否定——“窄狭”，只是窄狭而已，在转折的关口，他采取了平等对话的方式。他认为，“我们一时不习惯的东西，未必就是坏东西；我们读得不很懂的诗，未必就是坏诗”，朦胧诗的崛起是因为“人们鄙弃帮腔帮调的伪善的诗，进而不满足于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他主张对崛起“听听、看看、想想”，“适当容忍和宽宏”。他呼吁：“接受挑战吧，新诗。”“也许它被一些‘怪’东西扰乱了平静，但一潭死水并不是发展，有风，有浪，有骚动，才是运动的正常规律。”^②通过这种平和、平等的对话，作者促

①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

②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